

日本與東協合作關係的轉變： 「和平國家」邁向「正常國家」之路

The Change in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the ASEAN-The Path from "Peaceful Nation" to "Normal Nation"

黃頌顯

明道大學日文學系助理教授

二戰後日本的和平憲法引導日本走向「和平國家」之路。日本對東南亞的賠償也成為日本進入東南亞市場的契機。1970年代日本藉由「援助、貿易、投資」三位一體的方式，展現了優越的經濟實力。不過，東南亞五個國家則於1967年成立東協（ASEAN），以「聯盟合作」的方式爭取國家利益，保護本國經濟發展。1977年8月日本首相福田起夫提出「福田主義」，用來改善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緊張的經貿關係。

1980年代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營造東亞和平交流的環境，減少東西冷戰所帶來的對峙氣氛。但是日本內部也出現了邁向「正常國家」的呼聲。冷戰後，美軍撤離東南亞地域，日本與中國則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日本提供了300億美元的緊急支援體制，以及中國人民幣的抗跌、韓國受創等因素，使得ASEAN要請日本、中國、韓國共組ASEAN+日中韓區域合作組織，強化東亞區域的整合。

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之後，美國再度重視亞洲軍力，希望日本負擔更多軍事責任。2016年10月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因人權因素，對美國保持等距外交後，立即前往中國與日本，尋求兩國的支持，也可看出日本對ASEAN的影響力。本章著眼於分析此時期日本對東南亞外交政策的特點。

關鍵字：日本外交、東協(ASEAN)、和平國家、正常國家、福田主義

After WWII, the Peace Constitution of Japan led the country onward to the path of becoming a "peaceful nation". Japanese war reparations to Southeast Asia also became an opportunity for it to venture into the Southeast Asian markets. During the 1970s, Japan demonstrated its superior economic strength through the triad of "aid, trade, and investment." However, fiv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ubsequently created the ASEA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in 1967 in an effort to safeguard their nations' interests while protecting their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is strategic alliance. In an attempt to improve the strained trade and economic ties between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Takeo Fukuda proposed his Fukuda Doctrine in August 1977.

With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during the 1980s, an ideal environment for peaceful exchanges in East Asia emerged to mitigate the tension of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Nevertheless, demand for becoming a "normal nation" began to vocalize within Japan. After the Cold War, U.S. troops withdrew from Southeast Asian regions, and this made the roles played by Japan and China even more important. This was evident in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hen Japan offered USD 30 billion as emergency relief, as well as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resilience of the RMB against deflation, Korea's setbacks, and so forth. This prompted the ASEAN to reach out to Japan, China, and Korea to form the region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ASEAN plus Three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ASEAN regions.

In the wake of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has once again emphasized the value of military strength in Asia and expressed its wishes for Japan to shoulder mor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 Due to human rights issues, Philippines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chose to keep the nation's diplomatic distance from the U.S. in October of 2016, thus he promptly visited China and Japan to seek the two nations' support. This also reflects the influence Japan has over the ASEA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s diplomatic policies with the ASEAN in this specific period.

Keywords: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SEAN, Peaceful Nation, Normal Nation, Fukuda Doctrine

壹、「和平國家」與 東南亞經援體系

二戰後日本重新思考新的外交策略，從原本政治為主的外交路線轉變成經濟為主的外交路線。日本憲法第二章第九條限制日本軍力的和平條款，規劃出日本邁向「和平國家」的方向。「和平國家」主要是指日本前首相吉田茂

強調以經濟為主、軍事為輔的國家發展路線。

此一方向也反映在日本對東南亞外交政策方面。1950年代日本對東南亞的外交始於戰爭賠償。日本也以「對亞洲指導」、「對亞洲利用」自居，開展對東南亞的經援外交。日本也從償還生產物與勞務的方式，償還「過去」，加速日本的經濟復興與日本企業對東南亞的投資。¹

從1952年至1955年，吉田茂首相當時的國家發展路線主要是以對美的外交政策為主軸。²美國的冷戰圍堵政策與美元援助日本復

1. 玉木一德，〈日本とASEANの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外交青書》—からの教訓—〉，岡部達味編著，《アジア政治の未來と日本》（東京：勁草書房，1995年），頁236-237。

2. 中曾根康弘，《中曾根康弘が語る戦後日本外交》（東京：新潮社，2012年），頁86。

興的想法，也間接影響日本對東南亞外交的經援思維。1954 年日本加入以亞洲太平洋地區各國經濟及社會發展為目標的可倫坡計畫 (Colombo Plan)，以對外援助的方式，參加國際間的多邊經濟合作。緊接著，1957 年日本首相岸信介提出了「東南亞開發基金計畫」。

在岸信介執政期間，日本向緬甸、菲律賓、印尼、南越的賠償金額為 10.12 億美金；對寮國、柬埔寨的準賠償各為 2.8 百萬美元、4.5 百萬美元。³

1966 年日本召開了「東南亞開發部長級會議」，實施美國總統詹森的 10 億美元東南亞援助計畫。同年，日本第一次與東南亞各國召開政治性會議「亞洲暨太平洋理事會部長級會議」(Asia Pacific Council, ASPAC)。日本在會中堅持避免討論或涉及反共等特定目標。此為東協與日本首次政治結構的規範。⁴不過東南亞各國已瞭解單憑自身實力，實不足以和大國抗衡，而採取「結盟」的策略。1963 年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先組成「馬菲印多聯盟」(MAPHILINDO)。其後，1967 年 8 月 6 日，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五國外長又在曼谷舉行會議，並於 8 月 8 日發表《曼谷宣言》結盟為「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東協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1969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在關島發表「關島原則」，強調越戰結束後，美國將退出東南亞，讓日本承擔此任務。越戰的爆發，使得越南成為東西冷戰角力的場所。日本為保持經濟與戰略實力，僅提供軍機機場，而不參與越戰。日本雖獲得政治軍事上參與東南亞防務的機會，不過日本更將目標放在經濟領域。1969 年 10 月，日本實施了四次的海外投資自由化措施（至 1972 年 6 月），使得日本企業資金流入東協各國。1970 年代，日本積極向東南亞國家提供大量的政府低息貸款和援助，透過「援助、貿易、投資」三位一體的方式達成目標。

貳、東協的團結與「福田主義」

1970 年代日本在東南亞經貿策略的成功，也使得東協思考未來內部深化合作的重要。1971 年東協外長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發表《東南亞和平、自由和中立區宣言》(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ZOPFAN) 則是一例。ZOPFAN 成立後，東協則以集體談判的方式與其他國際組織、國家從事經濟談判。日本為了回應東協的要求，開始以正式的對話來解決日本輸出東協的橡膠議題。⁵1973 年 11 月東協與日本為解決橡膠議題，並成立「東協—日本橡膠論壇」。

1976 年 2 月對東協國家合作而言，具有嶄新的意義。東協國家簽訂《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TAC)，強調各國在尊重彼此主權，不干涉他國內政的立場展開合作。在經濟合作議題上，1977 年東協內部成員國之間也通過「貿易優惠安排協定」(the Agreement on ASEAN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加速彼此經貿交流關係。

1977 年 3 月日本與東協雙方成立「東協—日本論壇」(ASEAN-Japan Forum)。8 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提出「福田主義」三重點。日本不成為軍事大國、日本與東南亞關係不僅涉及政經層面，也包含「心靈接觸與相互信賴的關係」、日本與東南亞關係秉持對等立場。福田以柔軟的外交身段，強化與東協的交流。前外務副大臣自民黨籍議員杉浦正健也認為，日本對東南亞的外交應採取「紅樹林外交」政策。紅樹林不僅只有一個樹枝，而有許多的支柱。其根在海水中廣泛分布，氣根露出於空氣之中。種子從母枝落下，隨著潮流而繁衍，逐漸在淡水與鹽水的交界地增生。而且從巨木至小樹林，形成紅樹林。亞洲國家是多民族、多

3. 馮昭奎等著，《戰後日本外交—1945～199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頁 415。

4.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3 年），頁 68。

5. Suelo Sudo, Evolution of ASEAN-Japan Relat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5), p.8.

人種，不論是日中也好，日韓也好，日本應該重視每個國家，如同紅樹林向下紮根，如此才能消彌二戰的傷痕。⁶

1978 年越南出兵柬埔寨，遭東協反對。東協各國認為應該動員國際輿論，並維持民主柬埔寨的聯合國代表權問題。黑柳米司教授認為這是東協扮演「Pax Aseana」(東協治理下和平)的貢獻。黑柳進一步闡述「Pax Aseana」的意義在於並非是指霸權下的和平，而是一種「不具強制威脅性的主導權」，並且能統合東協各地區性機構，達成和平與安全的體制。⁷最後，東協在牽制越南所支持的柬埔寨韓桑林政權上，取得成效。

此外，日本也藉由外長會議、經濟部長會議保持與東協的高層官員持續保持對話。1978 年日本與東南亞雙方建立了「東協－日本外長會議」。日後，此會議發展為「擴大外長會議」。隔年 1979 年 11 月雙方成立「東協－日本經濟部長會議」(Economic Ministers Meeting, EMM)。日本同時開啟外交與經濟的高層部長協商。

參、東亞經濟整合與日本角色

隨著 1978 年 12 月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日本更加重視與中國大陸投資、貿易互動的商機。1980 年日本大平正芳首相提出「環太平洋連帶構想」，但是受到東協的反對。東協擔心被美國、日本附屬區域化。東協則希望能將規範的範圍擴大，進而在 1987 年修改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從 1985 年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增加。以 1987 年為例，與前一年投資相比亞洲的增幅為 109%，比其他區域投資增幅皆高。

亞洲主要是投資於四小龍(台灣、香港、韓國、新加坡)與東協。⁸東協的經濟潛力已受到日本的重視。

1989 年 12 月美蘇在馬爾他 (Malta) 進行高峰會，結束了冷戰的對立。冷戰結束後，日本又是如何看待東協呢？喬林生認為日本對東協的關係基本上可以從東西問題與南北問題來理解。東西問題主要是從支持美國對東亞的圍堵延伸而來。冷戰時期，日本通過對東盟的戰略協助，阻止了蘇聯和越南在東南亞的影響。冷戰結束後，又形成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的衝突。南北問題則是從日本以開發國家的人權、民主、軍控等標準對南半球發展中國家所做的制約來觀察。例如 1993 年日本《ODA 白皮書》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援助中，就考量到必須注意軍費支出和武器進口等動向。⁹

1989 年在澳洲總理霍克 (Robert Hawke) 的提倡下，成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亞太經濟整合的趨勢儼然成立。APEC 成立之初，各成員國是採共識的決議，並不以強制的方式來決議，也符合原本 ASEAN 共識決的宗旨。換言之，APEC 成為 ASEAN 另外一個可以發揮的國際舞台。冷戰後，東南亞又有一股抗衡西方經濟強權之主張。1990 年 ASEAN 成員之一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提出「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 Economic Group, EAEG)，希望聯合日本、南韓、台灣、香港和東協各國，對抗歐美經濟區域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潮流。1992 年，EAEG 更名「東亞經濟核心會議」(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EAEC)。2001 年 6 月 7 日、6 月 8 日，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七回國際交流會議中，探討了亞洲區域統合的可能性。馬哈地在會議上表示：「如果從現實與公平的準備情形來衡量，應抑止民主主義與全球化的過渡擴張。但若此制度能適合各個國家，容許其適性發展，拋棄以一國獨富、獨強的獨占角

6. 杉浦正健，〈戦争の傷跡はまだ癒えていない〉，日本經濟新聞社編者，《アジア地域統合の模索》（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01 年），頁 262-269。

7. 黑柳米司，〈「Pax Aseana」を求めて－アジア太平洋の世紀へのシナリオ－〉，岡部達味編著，《アジア政治の未來と日本》（東京：勁草書房，1995 年），頁 52-54。

8. 宋紹英，《日本經濟國際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238。

9. 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295-299。

度，則我們將會看到邁向全球化世界的希望。」¹⁰馬哈地的主張，也可以看出東協獨自發展路線的決心。

此舉引起美國高度警戒。1993 年 APEC 第五次成員國會議中，美國開始主張「新太平洋共同體」的構想，並以條約的方式規定政府之間的交往，目標是朝向「自由貿易」的方向邁進。美國以追求亞太地區的共同利益以及雙邊國家條約，共同推進地區性的自由貿易與經濟交流，發揮主導權 (Initiative)，提高存在感 (Presence)。¹¹美國是以 APEC 做為管控亞太貿易的平台，其中又潛藏著美國與 APEC 之間的競合關係。

但是 APEC 組織並不涉入軍事議題。美國與東協的軍事部署主要仍是沿襲冷戰時期的雙邊同盟條約。例如 1951 年與泰國和菲律賓的共同防禦條約。冷戰後，美國海軍西太平洋合作小組與空軍第四九七戰鬥訓練中隊駐紮在新加坡。1997 年美國軍艦更造訪馬來西亞。印尼也允許美艦停靠，汶萊則於 1992 年與美國簽訂國防備忘錄。¹²在美日關係方面，1996 年 4 月 17 日，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亞太地區，並於與日本共同發表「美日新安保宣言」。2000 年 5 月，森喜朗首相派遣日本防衛廳長官瓦力訪問新加坡，雙方對於使用新加坡軍事基地與參加新加坡海面舉行的多國潛艇救難訓練達成協議，強化雙方合作交流。美國在東亞地區仍以雙邊同盟條約的方式，展現其軍事力量的影響力。

肆、日本正常國家之轉型

1980 年代日本的經濟發展已經有長足的發展，日本遂有能力再將國家發展的重點集中在政治領域，突破原本吉田茂首相的執政框架。最明顯改變的例子是在中曾根康弘首相時期，採取了「新保守主義」的路線。「新保守主義」強調擴充軍備、修改憲法。

1985 年日本政府決心通過新的海空力量防衛計畫，以及獲得保衛海岸線 1000 英里以內海上運輸線的能力。新的防衛預算突破了三木武夫內閣所限定不超過 1% 的限制。¹³冷戰後，小澤一郎提出「正常國家」觀念，可包含兩方面。第一是強調負起國際社會中應負的責任。第二是努力建構國民活富裕安定的國家，地球環境的保護是人類共同的課題，日本應該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協助他國。¹⁴

楊鈞池教授認為日本政治是「新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對立。「新保守主義」又可以小澤一郎為代表；「新自由主義」則是鳩山由紀夫的路線為代表。小澤一郎主張日本必須政治改革，包括：強化首相官邸機能、執政黨重要幹部與內閣一體化、採取小選舉區制、政治資金全面公開，邁向「正常國家」。鳩山由紀夫則主張「採取論憲的立場」、強調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學習歐美社會福利。¹⁵日本的新保守主義與強化軍備的主張，則可以從軍援柬埔寨的事例中，看出日本的東南亞軍事佈局。1990 年 6 月日本在東京召開解決柬埔寨問題的會議。1991 年 5 月，海部俊樹造訪東協，表示希望和平解決柬埔寨問題。日本向海外派兵與否，國內也有不同的意見。經由柬埔寨一事後，更強化日本海外派兵的正當性，維持國際和平。1991 年 6 月宮澤喜一首相造訪東協。在曼谷發表「宮澤主義」，宣布日本

10. マハティール・ビン・モハマド，〈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を越えて〉，日本經濟新聞社編者，《アジア地域統合の模索》（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01），頁 21。
11. 山影進，〈ポスト冷戦期のアジア太平洋地域秩序の模索－ASEAN・APEC 關係の變容ととして－〉，岡部達味編著，《アジア政治の未來と日本》（東京：勁草書房，1995 年），頁 17-38。
12. 林文程，〈東亞的安全保障：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新挑戰〉，陳儋美主編，《轉換期的東亞與台日關係－三十年的分析與展望》（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 年），頁 152。
13. 梁雲祥等譯，大畑篤四郎著，《簡明日本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 年），頁 275-276。
14.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畫》（東京：株式會社講談社，1993 年），頁 104-105。
15. 楊鈞池，《從「和平國家」邁向「正常國家」：日本政治轉型之研究》（台北：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2 年），頁 70-79。

的「新亞太政策」，派兵至柬埔寨。10月23日，日本在巴黎和平會議 (Paris Peace Conference) 中承諾將幫助柬埔寨重建半數的經濟建設。在調停內戰方面，也努力促成洪森與親王施亞努 (Prince Sihanouk) 雙邊的和解，增強對柬埔寨內政的影響力。¹⁶ 1992年6月，日本又加快腳步，完成國內立法程序，通過國際和平協力法案 (International Peace Cooperation Law)，派遣600名自衛軍到柬埔寨維持和平任務，希望保持在亞太的優勢地位。

伍、冷戰後中國崛起

中國也注意到冷戰後東南亞軍事權力出現真空的現象。1992年6月，中國開始制定《領海及毗連區法》，將釣魚台列嶼以及南海諸島等均納入其領土範圍。此外，中國也加強與東協經濟關係。

1992年10月，亞洲開發銀行邀請中國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 (GMS) 開發計畫」。中國勢力延伸至中南半島的海上運輸線。日本為之抗衡並於隔年1993年，倡議「印支綜合發展論壇」，試圖參加大湄公河流域地區的發展，更提出「大湄公河次區域開發新概念」 (New Concept of Mekong Region Development)。¹⁷

1992年，東協規定十五年內成立東協自由貿易區，降低區域內關稅和對外國投資限制的鬆綁。東協自貿區的成立，使得東亞各國想加入區域組織，以避免在東亞經濟整合的過程中遭邊緣化。

東亞在整合的過程中，地域主義成為東亞各國追求的目標。Dent認為東亞國家，藉由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方式，逐漸地邁向了「凝聚性地域」 (coherent region) 的整合。各

國藉由社會層級「交往的凝聚」 (Associative coherence)、科技層級「整合的凝聚」 (Integrational coherence)、政治層級「組織的凝聚」 (Organizational coherence) 相互往來，建立起緊密的互動關係。不過，其中也出現「領導權」之爭的問題。例如是東協加三 (東協、中國、日本、南韓) 或是東亞峰會 (東協、印度、澳洲、紐西蘭) 哪一個集團才是具有真正的領導權。不可諱言的，中國與日本將是最重要的「地方領袖行為者」。¹⁸ 東協以合作的方式，成為東亞集團的核心。日本為了強化與東協的關係，積極地參與多邊的組織與會議。

此外，第一屆東協區域論壇 (ARF) 於1994年召開，東協以非強制性的原則成功地整合各國，包括東協的10個會員國 (越南、汶萊、緬甸、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 與10個 (澳大利亞、加拿大、中國、歐盟、印度、日本、南韓、俄羅斯、紐西蘭、美國) 對話夥伴國。此成果表現在對外與對內兩方面。對外可視為東協已具有與世界先進國對話之外交實力。對內則是能增加會員國之間對話的機會，降低區域性衝突危險的產生。東協更進一步於1996年召開第一次亞歐會議。東協首次以「東協加三」的方式與歐盟進行對話，日後更商討儲備金相互支援的金融議題。

陸、金融危機：「東協加三」

1997年1月，日本橋本首相訪問東協五國 (汶萊、馬來西亞、印尼、越南與新加坡)，並發表「橋本主義」。強調建構亞太安全架構，以平衡東南亞國家。7月東南亞發生金融風暴，泰幣貶值。東協更需仰賴中國與日本的協助。泰國、韓國經濟重創、印尼甚至產生政治危機。¹⁹ 金融風暴後，東協開始重視與中日韓

16. Yutaka Kawashima,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t The Crossroads: Challenge and Op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 117.

17.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頁110。

18. Christopher M. Dent Edite, "What region to lea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d questions of regional leadership." in Christopher M. Dent, ed. China, Japan and Regional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2008), p. 3-15.

19. 五百旗頭真，《戰後日本外交史》 (東京：有斐閣アルマ，2010年)，頁259。

三國的領袖對話機制。1997 年在吉隆坡舉行的第二次東協非正式會議，邀請了中、日、韓三國領袖舉行首度的非正式會談，讓「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的運作機制建立。橋本時期實現了東協加三非正式領袖會議。

1998 年 7 月小淵惠三接任內閣。12 月 16 日，小淵惠三在第六屆東協高峰會上，發表了日本新亞洲外交方針，「朝向開創亞洲光明未來之途」，並強調「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 的重要性，呼籲聯合國設立 5 億日圓規模的保障基金。1998 年日本政府提出「新宮澤構想」，共計提供 300 億美金的資金援助計畫。²⁰

1999 年 11 月東協加三高峰會發表了「東亞合作聯合聲明」，東協的互動產生變化。2000 年 1 月 5 日至 15 日，小淵惠三首相走訪柬埔寨、寮國與泰國等三個中南半島國家，強化對於中部國家的合作關係。日本提供人道援助、經濟援助，並希望東南亞國家支持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11 月森喜朗首相提出「東亞三原則」，其中表示希望將東協 10 + 3 的框架從經濟合作邁向政治合作。

²¹ 2000 年清邁協議，東協與日本針對外匯流動與國際收支問題相互支援。經濟合作的議題成為日本與東協國家關係的聯繫命脈。

柒、911 事件：邁向全面經濟合作關係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國五角大廈遭到攻擊，國際局勢區於緊張。美國需要日本協助，維持其在東亞強權的地位。11 月在 APT 高峰會議上，中國總理朱鎔基提出建立「中國 - 東協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的設想。東協的自由貿易區的想法，卻得到中國的支持。此十年完成的設想將納入 19 億以上的人口與 6 兆美元國民生產毛額，東協與中國和全球其他市場貿易額達 4.5 兆美元，約佔全球貿易的 13.4%。僅次於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²²

2001 年小泉純一郎首相主張結構改革，推行郵政民營化政策，引進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但美日經濟發展卻有不同的思路。美國藉由世界的「情報革命」，活用國內創新的中小型企業，結合矽谷的產業鏈，成功地開創了「全球標準」的產業經濟。但是在日本，卻因拘泥於文字上的「全球標準」，推廣「結構改革」，而導致經濟的停滯。²³

但是東協的市場，卻成為日本開創商機的新地區。2001 年日本小泉首相決定援助建設湄公河兩條「東西經濟走廊」的想法。此決定一方面能分散國內經濟改革成敗的風險，另外一方面也可藉此抗衡中國的「南北走廊」。2002 年 1 月，小泉首相展開東南亞之旅，先後訪問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新加坡等五國，重提「福田主義」。小泉希望與東協建立「率直的夥伴關係」。2003 年日本與東協也接著簽訂「東協與日本全面經濟伙伴架構」，宣告在 10 年內締結 FTA。同年 10 月中國與印度先後與東協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東協讓中國與印度成為東協的非東南亞國家成員。2003 年也是日本與東協之交流年 (Japan-ASEAN Exchange Year)。12 月東京舉行的日本與東協建立夥伴關係三十週年紀念，揭示日本與東協共同致力於「東亞共同體」的努力。2004 年雙方更同意將「東協加三」高峰會改成「東亞高峰會」，計畫邁向「東亞共同體」。2005 年 12 月第一屆東亞峰會召開，簽署《關於東亞峰會的吉隆坡宣言》。就經貿、金融、能源及跨國問題交換了意見。此東亞峰會乃是 APT 的擴大。

20.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頁 130。

21. 同前註，頁 124。

22. 梁文興，《東協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翁明賢等主編，《國際關係新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頁 143。

23. 蛭名保彦，《日本經濟の再生と東アジア「東アジア産業集積地域ネットワーク」の提唱》，初岡昌一郎、蛭名保彦編著，《アジアの經濟と社会—「ソーシャル・アジア」を求めて》（東京：明石書店，1998 年），頁 36。

2007 年 9 月福田康夫組閣，延續其父福田赳夫之政見主軸，重提「新福田主義」，擴大與東南亞的交流。福田康夫強調日本不成為軍事大國，建立心靈相互交流的信賴關係，日本將以同等的立場協助東南亞的和平與繁榮。

²⁴ 2008 年 5 月 22 日，福田首相發表日本新五個外交理念。「新福田主義」強調與東協互動。2008 年底，日越簽訂「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翌年，日本也恢復給予越南提供政府開發援助貸款。

麻生太郎重視越南、寮國、柬埔寨三國的關係，並且訂 2008 年為日本湄公河交流年。2008 年 3 月日本與東協簽署「日本－東協全面經濟合作夥伴協定」(Japan-ASE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JACEPA)，並與中國即將在 2010 年組成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CAFTA) 抗衡。2008 年 4 月，日本與東協簽訂 FTA（自由貿易協定），象徵日本與東協新時代的來臨。

2009 年 9 月，民主黨鳩山由紀夫政權成立，提出東亞共同體的觀念，納入「東協加六」(ASEAN+6)。換言之，鳩山有意拉攏東協、中國，走出另一條有別於傳統美日合作的路徑。11 月鳩山在東京與湄公河五國領袖進行高峰會。日本此舉是希望強化與緬甸的經貿關係，以及開發湄公河的區域。2009 年，日本以 200 億美元希望打通中南半島東西線，建設橫貫越南、泰國、緬甸、柬埔寨的東西走廊經濟圈計畫。其後，合作範圍更擴充至印度，形成印度湄公河次區域經濟走道計畫，爭取日印合作。2010 年 10 月，日本首相菅直人在越南參與東協與中日韓 (ASEAN+3) 領袖高峰會。雙方磋商了稀土開發問題、核電廠建設等議題。雙方也設立了每年外交部、國防部副部長級出席的戰略對話機制。2013 年 1 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東南亞三國（越南、泰國和印尼）。

此外，原本由軍政府所掌控的緬甸也邁向

了民主化。日本洞燭機先，安倍首相於 2016 年 11 月決定在五年內支援緬甸 8000 億日圓（台幣 2447 億餘元），在農業基礎建設、創造工作機會、振興產業、集中製造業等 9 大領域提供相關幫助；並且提供客船支援緬甸西部居民的交通工具，派遣負責培養人才的日本青年海外協力隊。²⁵日本再度以經援等外交方式，打開緬甸市場，著眼於未來日本產業的市佔率。

捌、南海議題

南海距離日本本土遙遠，為何日本重視此議題。除了中東石油航道經過此地之外，也可從日本對中外交的立場來理解。例如日本希望以南海與東海議題相結合，牽制中國。2011 年 7 月 4 日，日本外務大臣松本剛明出訪北京，在日中外長會談上針對南海議題指出，「自由航行」與海上安全的重要性。此外，日本也有意將東海與南海問題加以連接，以爭取與聲索國的合作。²⁶在中國與菲律賓的黃岩島南海主權紛爭的仲裁案中，日本也是支持菲律賓的立場。

2015 年日本新安保法案通過，日本增加支援他國軍事行動。支援南海則可解釋適用「某個國家正在填海造陸，緊急時就有必要支援他國」。²⁷今後日本更重視對東南亞國家的政軍經略。

2016 年中國與菲律賓的黃岩島南海主權紛爭由荷蘭海牙仲裁法庭審理。大陸國務院參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認為，大陸已經獲得俄羅斯、汶萊、印度、寮國等國家支持，未來也會往建立自己的「國際海事司法仲裁中心」的方向邁進。²⁸中國對於南海的外交政策強調「亞洲特色」、「亞洲特點」的治理模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在 4 月 28 日，亞洲相

24.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頁 148。

25. 〈安倍會晤山蘇姬 金援緬甸 8000 億日圓〉，《中國時報》，2016 年 11 月 4 日，第 A4 版。

26. 何思慎，〈日本與東協國家在「南海問題」的合作〉，趙全勝主編，《日本外交研究與中日關係——海內外華人學者的視角》（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頁 379-380。

27. 〈日眾院通過安保法案〉，《中國時報》，2015 年 7 月 17 日，第 A1 版。

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中表示，中國願與南海建設成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²⁹另外日本與印尼的互動中，也可以看出日本邁向正常國家、海洋國家之決心。2016 年 10 月 7 日，安倍首相與印尼海洋事務統籌部長盧胡特舉行會談。安倍首相強調雙方都是海洋國家，希望發展戰略夥伴關係。³⁰

不過，菲律賓新任總統杜特蒂上台之後，卻給美菲關係投下變數，另一方面也凸顯出中日兩國對東協國家的重要性。新任菲律賓總統杜特蒂上台之後，整飭國內治安掃毒，引起美國與聯合國的高度關注，希望杜特蒂必須在尊重人權的立場上，處理此事。杜特蒂表示要與美國保持距離，並將加強與日本、中國的關係。從杜特蒂出訪中國表示將擱置「南海主權」，共享「經濟合作」的果實。原本菲律賓在司法仲裁案勝利後，劍拔弩張的中菲關係，瞬間解消。日本也審慎地看待日菲關係，不作干涉菲國內政之評論。日本海上自衛隊幕僚長武居智久於 2016 年 9 月 27 日表明，日本並無計畫單獨或者與美國一起展開南海航行的自由行動，正確應變了菲美關係生變後的日菲情勢。大陸也在 2016 年 9 月，杜特蒂決定於 10 月訪問中國後，暫緩黃岩島的造礁計畫，營造中菲良好的互動契機。³¹9 月 28 日，杜特蒂又在越南宣布，10 月的美菲聯合軍演，將是最後一次。此發言打破了美菲兩國自 1951 年簽署《共同防禦條約》以來，每年定期進行多場軍事演習的慣例。³²

杜特蒂於 10 月 18 至 20 日訪中後，又於 25 日起訪日，與日方取得政治與經濟兩方面的合作成果。日本將提供兩艘大型巡邏船，以提高菲律賓的海上巡防能力；以及 50 億日圓（約新台幣 15 億 1 千 3 百萬元）借款，支援菲律賓發展較慢的經濟地區使用。同時杜特蒂也強調要與中國為友，不需要設置飛彈或是設機

場，引發不必要的衝突。希望駐留外國的軍隊能在 2 年內撤退，主要是暗指希望美軍撤軍的時間。³³此次，杜特蒂訪日主要的目的有三。第一是強化與日本的友邦關係。第二是重申親中反美的立場。第三是強化本身國防與經濟的實力。不過杜特蒂訪日回到菲律賓之後，又表示將改變個人言論的發言方式，顯示日菲合作對美菲關係的改善仍起了作用。菲律賓的例子也可以解讀成日本在東南亞長期耕耘所取得的外交成效。此外，菲律賓夾在大國中國與美日先進國中間，以東協為防護網，開創了獨立自主的外交道路。

玖、小結

2016 年 9 月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東南亞，國安顧問萊斯（Susan Rice）強調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對美國在區域領導力的重要性。美國將中國比喻為「競爭者」。³⁴日本安倍首相也是支持 TPP。2016 年 11 月，日本即將審議通過此法案。不料，反對 TPP 的美國新總統川普執政。日本透過 TPP 機制，強化貿易出口的計畫勢必受到影響，東協是否會支持 TPP 也仍待觀察。

日本是以非強制性與制約性兩種方式與東協保持密切互動關係，前者例如加入東亞高峰會，簽訂經濟夥伴協定則屬後者。

綜合而言，二戰後日本對東南亞的賠償打開了其經援之路，更擴增至投資、貿易等領域。後開發的東南亞國家成立東協與日本等先進國斡旋。日本面對的是東協團結的組織，而非單一的國家。冷戰後，東亞興起區域整合的浪潮，但金融體制脆弱的東南亞，卻發生金融風暴。金融風暴後，東南亞開始引進中國、日

28. 〈中菲黃岩島主權紛爭〉，《中國時報》，2016 年 4 月 29 日，第 A12 版。

29. 〈習：捍衛南海主權 不容朝鮮戰亂〉，《中國時報》，2016 年 4 月 29 日，第 A12 版。

30. 〈安倍與印尼總統親信會談 確認就南海問題展開合作〉，《共同社》，2016 年 10 月 7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6/10/128242.html>>。

31. 〈菲示好 陸暫緩黃岩島造礁〉，《中國時報》，2016 年 9 月 28 日，第 A9 版。

32. 〈菲美聯合軍演 杜特蒂：任內最後一場〉，《中國時報》，2016 年 9 月 30 日，第 A5 版。

33. 〈南海問題 杜特蒂與日合作因應〉，《中國時報》，2016 年 10 月 27 日，第 A8 版。

34. 〈歐巴馬首訪泰國 美主推 TPP〉，《中央通訊社》，2016 年 9 月 6 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609060015-1.aspx>>。

本、韓國等國的力量，來減少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911 事件後，日本軍事力量逐漸增強，強化了與東南亞軍事合作關係。同時，隨著中國在東南亞勢力的增長，日本也更積極地與東南亞建立經貿合作關係。

邁向二十一世紀中期，國家是否能在國際政治經濟的潮流中勝出，最主要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參與或是制定國際準則 (Internaitonal Norms)。日本也受國際準則 (Internaitonal Norms) 的影響。³⁵日本與東協的關係可謂十分密切。從東協加三的機制，以及東亞峰會 (East Asia Summit, EAS)、東協區域論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亞洲合作對話 (Asia Cooperation Dialogue ,ACD) 。日本顯示了參與多邊合作機制的決心。

日本對東南亞外交政策之「重視」是其成功的秘訣。日本善用自己的經濟強項，在「和平國家」時期，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經濟合作關係。冷戰後國際局勢的改變包括中國崛起、北韓的核武發展，都加速日本朝「正常國家」的道路上邁進。日本也開始以「軍事」等選項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交流。未來隨著美國總統由民主黨籍歐巴馬轉變成共和黨籍川普執政。川普的競選政見中，主張本國優先的保護主義，削減在海外的軍力。日本如何因應此東亞新形勢，強化與東協的政經關係將是未來主要的外交課題。

35.Keiko Hirata,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Civil Society: New Influences on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in Yoichiro Sato and Keiko Hirata, eds. ,Norms, Interests, and Power i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47.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中國時報 (2015) 〈日眾院通過安保法案〉,《中國時報》,7月17日,第A1版。
- 中國時報 (2016),〈中菲黃岩島主權紛爭〉,《中國時報》,4月29日,第A12版。
- 中國時報 (2016),〈安倍會翁山蘇姬 金援緬甸8000億日圓〉,《中國時報》,11月4日,第A4版。
- 中國時報 (2016),〈南海問題 杜特蒂與日合作因應〉,《中國時報》,10月27日,第A8版。
- 中國時報 (2016),〈習:捍衛南海主權 不容朝鮮戰亂〉,《中國時報》,4月29日,第A12版。
- 中國時報 (2016),〈菲示好 陸暫緩黃岩島造礁〉,《中國時報》,9月28日,第A9版。
- 中國時報 (2016),〈菲美聯合軍演 杜特蒂:任內最後一場〉,《中國時報》,9月30日,第A5版。
- 共同社 (2016),〈安倍與印尼總統親信會談 確認就南海問題展開合作〉,《共同社》,10月7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6/10/128242.html>>。
- 中央通訊社 (2016)〈歐巴馬首訪寮國 美主推 TPP〉,《中央通訊社》,9月6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609060015-1.aspx>>。
- 宋紹英 (1997),《日本經濟國際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 (2013),《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翁明賢等主編 (2013),《國際關係新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梁雲祥等譯,大畑篤四郎著 (2009),《簡明日本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陳儔美主編 (2003),《轉換期的東亞與台日中關係—三十年的分析與展望》,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喬林生 (2006),《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北京:人民出版社。
- 馮昭奎等著 (1996),《戰後日本外交—1945~199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楊鈞池 (2012),《從「和平國家」邁向「正常國家」:日本政治轉型之研究》,台北: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趙全勝主編 (2015),《日本外交研究與中日關係——海內外華人學者的視角》,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二、日文部分

- 岡部達味編著 (1995),《アジア政治の未來と日本》,東京:勁草書房。
- 五百旗頭真 (2010),《戰後日本外交史》,東京:有斐閣アルマ。
- 初岡昌一郎、蛭名保彥編著 (1998),《アジアの經濟と社會—「ソーシャル・アジア」を求めて》,東京:明石書店。
- 小沢一郎 (1993),《日本改造計画》,東京:株式 社講談社。
- 中曾根康弘 (2012),《中曾根康弘が語る戰後日本外交》,東京:新潮社。
- 日本經濟新聞社編者 (2001),《アジア地域統合の模索》,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

三、英文部分

- Christopher M. Dent, ed. (2008), *China, Japan and Regional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 Sueo Sudo (2005), *Evolution of ASEAN-Japan Relat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Yoichiro Sato and Keiko Hirata, eds. (2008), *Norms, Interests, and Power i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Yutaka Kawashima (2003),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t The Crossroads: Challenge and Op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